

教育周刊



2016.1.21
星期四
第3期

威海市城里中学校长丛培良 文化“泥瓦匠”让WIFI遍校园

走进威海市城里中学，“文化”两个字处处留影，让人感受良深。这种文化不仅是校园内一草一木的介绍牌，也不仅仅是教学楼东、西楼梯一至四楼的文化墙，更是深入学校领导心中的文化内涵。

文化作底蕴，理念才能更创新，作为威海市首批特色学校，城里中学的“教育信息化”特色建设走在了前列。

“目前学校已经实现了WIFI全覆盖，硬件设施达到威海市‘五个’第一。”丛培良说。

文/本报记者 李孟霏 图/本报记者 陈乃彰

百年名校铸造“清泉文化”

走进城里中学，丛培良校长先跟记者说起了学校的文化。而记者也留心到，在学校的每一个楼层，都有相应的文化主题，除了有威海、山东、中国、世界的文化外，还有世界各大名校的介绍、知名作家的介绍、传统手工艺的介绍等等。

“这些照片都是我去年去档案馆一幅幅找来的。”说话间，丛培良指着墙上的一幅幅老照片说，“让孩子们看到这些变化，让他们更了解自己学校的变化，了解这个城市的变

化，让优秀的学校文化使学校真正变成一个人人凝聚的文化场，让学校成为教师享受职业幸福的精神家园，成为孩子健康成长、实现梦想的精神动力。”

说到文化，丛培良校长介绍，威海市城里中学的文化历史得追溯到1403年，其前身为六百年前之明伦堂，植根于明代威海卫之文庙内。因为文庙地处清泉泉，故于1900年命名为清泉小学。

1930年中国政府收回威海卫，

翌年更名为清泉实验小学。1946年威海卫光复，改校名为群爱小学。1948年威海解放，即易名城里中心小学，后来改称城里完全小学。1972年开始兼招初中班，因此改名城里中学，1984年停办小学部，逐渐过渡到全部招初中班，于是在1988年9月勘定校名为威海市城里中学。

围绕“清泉文化”这一核心理念，学校全力打造了学校文化体系，整个体系包括八个部分，分别

是理念文化、行为文化、环境文化、管理文化、课程文化、校本培训文化、教科研文化和虚拟校园文化。重新布置教学楼东、西楼梯一至四楼的文化墙，充分发挥名师对整个师资队伍引领作用，引导师生从新的高度审视教育，认识学习的重要性。



指尖上的教学改革 让信息化遍布校园

“校园网、多媒体教室2代、录播教室、探究实验室、电子书包实验室……”提起学校的信息化建设，丛培良校长侃侃而谈，他告诉记者，学校的信息化建设主要分为五个方面：除了硬件设施超前外，教师的信息素养、孩子的信息素养、教学资源库、模式创新一个都不能落下。

“在这里做题很方便，老师讲解时也更直观。”在城里中学的电子书包教室，正在上英语课的学生们正在老师的指导下做英语题。

只见每个桌子上摆着四个对着的平板电脑，每个电脑上都有一套英语试题，学生只需要轻轻一点试题下面的选项，选项就会变色，如果要修改选项，只需再点一次即可改变。

而通过这些数据分析平台或

软件(电子书包平台、优课平台、Excel等)，教师对学生的答题情况、分数段分布情况、典型题目等进行分析，通过大屏幕展示给学生，让学生对自己的学习效果做到心中有数；然后明确试卷的考点考察情况、试卷的难易程度等。

2015年，城里中学又结合威海市生命化课堂教学模式和“目标—教学—评价”一致性理念，以信息技术为手段，立足课堂，面向全体，尊重差异，构建了信息技术环境下“四课型——四环节”课堂教学模式，四课型为新授课、复习课、讲评课、实验课。

“以植物的光合作用为例，以前的老师可能只是枯燥的讲解，现在的老师则通过信息化的手段，在电脑上演示出整个光合作用的过程，是不是很神奇？”丛培良说。



校长说

智慧当先，校园就会更和谐

采访中，丛培良校长一直提到“智慧”两个字。而对于“智慧”两个字，他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。

“我们不仅要打造智慧校园，而且还要打造智慧教师队伍和智慧学生。”丛培良说，智慧的教师更懂得工作不仅仅是教学，也要协调师生之间的关系，老师和家长的关系，会教学、能教学、教好学。而智慧的学生，也不仅仅是学习为第一位，品德好、身体好才更为关键。“我告诉他们学习好也放到这两个后面，有了智慧的教师，有了智慧的学生，有了智慧的家长，也就有了智慧的校园。”

书评

■高婷

作为20世纪70年代末、80年代初兴起于美国的新历史主义批评运动的命名者、推动者和最具影响力的实践者，斯蒂芬·格林布拉特一直有着“新历史主义之父”之称。现在莎士比亚研究中一些我们熟知的术语，如“自我塑造”、“社会能量的流通”、“颠覆与抑制”、“回声与惊奇”等，都是首先由他提出并引发了大量的讨论。可以说，他是二十世纪后半叶莎士比亚研究新版图的主要绘制者之一，在这一领域的影响几乎无人能及。

曾经，格林布拉特作为一名形式主义和旧历史主义的双重叛逆者的姿态，引领了莎士比亚研

究中的新历史主义运动，一时风头无两。但是，随着新历史主义运动的深入，它内在的问题和矛盾也逐渐显露出来，从而在今天面临着新的批评趋势的挑战。而早已功成名就的格林布拉特，则又处在了当年他所反对的人的位置，成为一名“被叛逆”的对象。显然，莎士比亚研究领域一场新的范式革命正在悄然酝酿。此时，如何评价格林布拉特和他的新历史主义，对于20世纪后期的莎士比亚批评的意义、对美国文学批评的意义，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迫切的任务。

朱静的专著《格林布拉特新

历史主义研究》为我们完成这个任务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。作者通过对格林布拉特的批评文本进行深入细读，为我们展示了他的新历史主义的批评假设和操作方法，令人信服地指出其洞见的同时，也揭示出其中固有的问题和矛盾。而且，作者并没有就事论事，把自己的研究视野局限在格林布拉特，而是把他放在20世纪后半期以来的美国历史和文化语境中，对他进行全面和整体的考察，探究格林布拉特之所以成为格林布拉特的原因。这样，对格林布拉特的研究就不只是对他的研究，而是以他作为一个样本，让我们得

以窥见当代美国批评家的一些普遍的成长和经历，也得以窥见美国当代文学批评、甚至是当代文化几十年的变迁。如过去方能策略未来。在这样一个继往开来的时刻，《格林布拉特新历史主义研究》让我们清楚地知道在莎士比亚研究领域、美国文学研究领域过去发生了什么，那么对于将来会发生什么，也就不会如雾里看花般无措，而是了然于心了。这也许是这部著作最重要的意义所在。

《格林布拉特新历史主义研究》，朱静著，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五年版，39元。